

## 概要

亚洲仍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但由于全球复苏依然乏力、国际贸易增长放缓以及中国增长转型带来的短期影响，亚洲面临着严重的阻力。不过，只要加强改革，亚洲完全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为了提高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并保持经济活力，亚洲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应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政政策空间，同时在需要时支持需求。

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在 2016-2017 年将小幅下降到 5.25%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复苏乏力。由于外部需求仍相对疲软，而全球金融条件已开始收紧，所以在亚洲地区的多数经济体，国内需求预计将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劳动力市场状况稳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一些经济体还采取了宏观经济刺激措施，这些都将对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起到促进作用。

下行风险在经济形势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全球增长速度慢于预期，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加上亚洲地区的高杠杆，可能给该地区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高债务环境下，信贷和金融周期的转向会对亚洲的增长造成显著风险，尤其是考虑到该地区多数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债务水平在过去十年里大幅上升。

此外，尽管中国为实现更可持续增长而进行的经济转型在中期内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近期内仍可能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第二章评估中国经济再平衡对亚洲地区经济体和金融市场的潜在溢出效应。总体而言，亚洲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敏感度已经上升。中国的再平衡在中期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好处，但很可能带来负面短期效应，尽管对于那些受中国消费需求影响更大的经济体，可能会有相对较为有利的影响。中国对本地区市场（特别是股票和外汇市场）产生的金融溢出效应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扩大，与中国贸易联系较强的经济体所受影响更大。

第三章分析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对处于生产或价值链上游的发达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该章通过相关证据指出，由于中国已将过去进口的中间产品转到境内生产并开始出口这些产品，处于上游的发达经济体丧失了一些产品的市场份额。在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大宗商品消费增长也已放缓，但只有一些出口国的出口量增长显著下降。许多出口国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更大影响，而这种下跌只有一部分可归因于中国的再平衡调整。

亚洲地区面临其他重要的下行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贸易中断。在日本，尽管安倍经济政策起了支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尚未实现持久改善。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滑可能导致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更广泛而言，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形势可能造成严重的贸易中断，导致经济普遍下滑。最后，对多数亚太经济体来说，自然灾害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风险。由于基础设施较差，并且在地理位置上容易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低收入、前沿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太平洋岛国面临的风险尤其大。

从上行因素看，地区和多边贸易协议能够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在这些协议上进一步取得进展，例如，扩大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使亚洲地区许多经济体受益。

在促进亚洲应对挑战并保持全球经济引领地位方面，政策将起到什么作用？为充分发挥亚洲的潜力，必须在支持需求，缓解外部冲击的影响的同时，实施广泛的改革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支持经济转型和促进潜在增长。多数经济体应逐步开展财政整顿以重建政策空间，但一般同时也应调整支出结构，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扩大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货币政策仍应侧重于支持需求和应对近期风险，包括汇率大幅贬值和通货紧缩冲击带来的风险。最近几轮金融动荡突出表明，需要采取灵活主动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政策目标的有效沟通也有助于提升信心和减轻市场波动。为管理高杠杆和金融波动带来的风险而实施的政策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实行灵活的汇率，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在一些情况下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为确保亚洲继续引领全球增长，推进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再平衡调整、减轻脆弱性并提高经济效率和潜在增长率，因此十分必要。在一些经济体，改革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特别是在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大型国家。过去的改革已证明十分有效，包括提高了经济和贸易多元化程度，并促进亚洲进入全球市场。但需要实施新一轮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日本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以及印度和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为消除瓶颈而实行的改革。

还需要通过改革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包括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地区形成对比，亚洲多数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加剧）。第四章发现，与过去情况不同，迅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无法再现“公平增长”的奇迹。该章指出，必须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特别是要扩大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渠道，并提高金融和性别包容性。在这方面，财政政策是解决不平等加剧问题的重要工具，包括通过扩大社会支出覆盖面和提高税收累进程度等途径来实现。